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地方历史文化特色项目

王炜中等 编著



# 潮汕侨批论稿

陈伟南  
题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地方历史文化特色项目

(批准号:GD10DL06)

# 潮汕侨批论稿

编 著:王炜中

杨群熙

陈 骅

王汉武

林庆熙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翻  
印  
必  
究



版  
权  
所  
有

### 潮 汕 侨 批 论 稿

编 著：王炜中、杨群熙、陈 骅、王汉武、林庆熙

---

出 版：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 3 楼

电话：00852-26706633

传真：00852-26701382

印 制：春风印务

开 本：889×1194 毫米 1/16

字 数：255 千字

印 张：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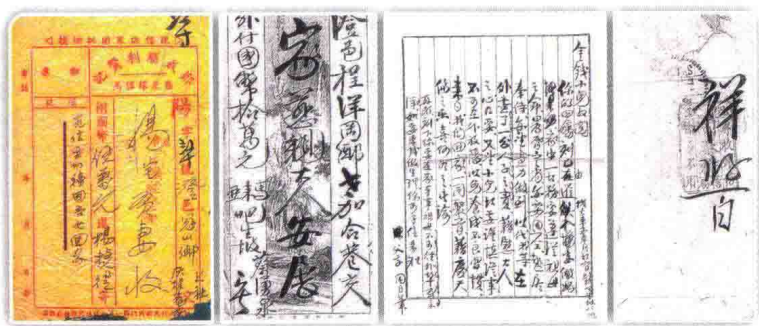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

ISBN : 978 - 962 - 450 - 804 - 8 / E • 008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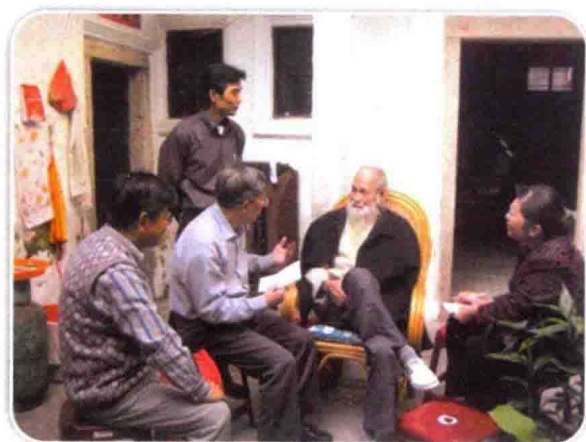
水客递送的批信



1835年，澄海籍黄继英创办新加坡“致成棧”批局，这是1909年批局收寄的侨批



东南亚各地的潮籍侨胞寄给家乡亲人的侨批



研究人员到澄海图濠乡访问98岁的老侨批业者曾声烈（右二），积极抢救侨批档案遗存



侨批派送员送批“四件宝”——市篮、水布、批袋和纸雨伞



研究人员到揭阳魏启峰批局旧址进行田野调查



首届侨批文化研讨会

# 序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王炜中等五位同志，接受广东省社科联的委托所编写的《潮汕侨批论稿》拟近期付梓出版，我在此写上几句话。

记得 2007 年 8 月，我应邀为王炜中、杨群熙、陈骅编著的《潮汕侨批简史》撰写的“序言”中写道：“这部书是反映潮汕侨批历史的第一部，我们认为仍有待深化，其粗糙、错漏在所难免，祈盼更多的读者、专家学者多提出意见、建议，在将来需要再次增订时加以补正充实。”5 年之后的今天，他们 3 位联同王汉武、林庆熙联袂撰写的《潮汕侨批论稿》便告成了。

《潮汕侨批论稿》(下简称《侨批论稿》)一开始是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侨批的“家史”，是源于海外移民，即“有侨才有批”，为侨批溯源。这将让人们了解侨批的“前世今生”，有助于客观、全面地了解它，准确、科学地评价它。

接着，《侨批论稿》对侨批业态的经营方式、侨批历史贡献，分别做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从侨批来的业务、经营方式中清晰地提示出侨批业的实质，在于它融汇了汇兑和邮传功能于一体，而银钱汇兑的金融功能是业中之重，正因为如此，才由个体作业的水客递送，衍传发展为规模不小、影响甚大的行业，并跟银行、银庄一起，催生了地方虚位货币——“直平七兑银”、“七兑银票”。对侨批的历史贡献的论述，为尘封多年的珍贵文化遗存作出公允全面的评价。

《侨批论稿》对这些年来侨批文化研究思路和开展的状况，做了比较系统详尽的评

述,明确地指出这一研究正从自发到自觉、从无序到有序、从分散到集中、从必然到自由的过渡,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所取得的成果。与此同时也指出了当前存在的若干问题,这对于今后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也有所帮助。

《侨批论稿》论述的侨批基本属性与文献价值也很值得人们去深入探讨。在第四章中对侨批本质的民间特色、跨国特征、系统翔实等几个基本属性进行了论证,并从侨批的产生、流转、经营等方面说明它的确是深深扎根于民间的原生态“草根”档案文献。侨批还是在跨国环境中诞生,侨批业是在跨国渠道中运作,海外侨胞和家乡亲人的信息,也在跨国网络中交流。跨国特征突出。侨批的时空系统性甚强,以潮汕侨批为例,就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它涵盖的空间也相当固定,主要集中在本土的潮汕地区和海外南洋(即东南亚)诸国。侨批都出自平常百姓之手,因此显得格外朴素、真实,“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当时海内外社会的具体状况,且内容相当丰富,囊括了家情、乡情、国情以至世情。这些基本属性表明,侨批可谓是海内外华侨华人社会的“百科全书”,涉及经济、政治、海外移民、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与典籍文献互为印证,并补充典籍文献记载的不足,成为人类记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研究工作者不仅可以从中窥视到历史发展的履痕,而且能够透过社会细胞的家庭,从最基层的视角,更为深入、客观地审视历史、研究问题。数字化记忆方式的问世,侨批越来越显得珍贵,这就使尘封了 60 多年的它所具有的文献价值充分地凸显出来,其世界意义也为世人所认同。正因为如此。包括潮汕侨批在内的“侨批档案”,2010 年被列入我国《国家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今年则成功晋级,被列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申遗”的成功,这就意味着对侨批的研究要进一步引向深入,《潮汕侨批论稿》的问世,对此会起一定的积极的作用,这也是作者所期盼的。

2012 年 8 月 29 日

(作者系汕头市政协原主席、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创会理事长)

# 目 录

序 言 .....	刘 峰
第一章 潮汕海外移民与侨批的产生 .....	1
第一节 潮汕海外移民 .....	1
第二节 潮汕侨批的产生 .....	10
第二章 潮汕侨批业的业态和经营方式 .....	15
第一节 潮汕侨批业的发展轨迹 .....	15
第二节 潮汕各市、县的侨批业 .....	49
第三节 海外各地和香港的批(银)信业 .....	69
第四节 潮汕侨批业的组织结构和业务经营 .....	115
第五节 诚信是立业之本 .....	134
第三章 侨批的历史贡献 .....	141
第一节 赡养众多的侨胞眷属 .....	141
第二节 维系侨胞与家乡亲人的感情 .....	147
第三节 促进侨乡经济的繁荣发展 .....	155
第四节 实现海外侨胞报效乡梓的夙愿 .....	166

---

第五节 增强华侨团结,推动华侨社会发展 .....	173
<b>第四章 侨批基本属性与文献价值 .....</b>	<b>177</b>
第一节 民间特色鲜明 .....	177
第二节 跨国特征凸显 .....	187
第三节 记载系统翔实 .....	195
第四节 内容丰富多样 .....	215
<b>第五章 潮汕侨批文化研究 .....</b>	<b>240</b>
第一节 早期侨批文化研究的状况 .....	240
第二节 为研究搜集积累侨批资料 .....	243
第三节 侨批文化研讨会 .....	263
第四节 侨批文化研究成果 .....	280
一、撰写大量论文 .....	280
二、出版一批专著 .....	290
三、创办《侨批文化》刊物 .....	297
第五节 有待改进、拓展的若干问题 .....	298

# 第一章 潮汕海外移民与侨批的产生

## 第一节 潮汕海外移民

潮汕海外移民与潮汕侨批有着因和果关系，如果没有潮汕源源不断向海外移民，就没有潮汕侨批及潮汕侨批业的产生和发展。

### 潮汕的海外移民历程

潮汕向海外移民的最早时间，因缺乏历史记载，至今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潮人最早远达南洋经商、谋生有迹可寻是在宋元期间。

宋至元代，潮州为粤东第一大港，南澳岛是中南海上交通贸易的必经之地。潮州地区在此期间不断有境外移民迁入，人口数量获较大幅度增长，经济开始全面开发，其中韩江交通资源的开发，还使其逐步发展成为粤、闽、赣交界的主要商品集散枢纽，从而促进瓷业、盐业及与其相关的工商贸易业和航运业逐步繁荣，加上当时朝廷重视对外贸易，对沿海商民流居海外经商比较开放，潮州城郊笔架山和饶平新丰九村窑区出产的瓷器，这期间除了以“朝贡贸易”的方式，由官方批准在指定的港口出海运销国外，许多还由私商与外舶通过民间“市舶贸易”的方式，从潮州、南澳等港口运往南洋、西欧各地销售。日趋繁荣的对外贸易，为潮汕商民贩货往来异域提供方便，因此便有一些潮州商民因经商而迁留海外，称为“住番”。元兵于至元十五年(1278)攻陷潮州城，到处“焚

民室庐”，杀戮无辜百姓，时惨遭劫杀的百姓和不满元兵统治的军民为了活命，又有不少先后逃离家园，到海外另谋生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潮州地区还有一些壮丁、水手，随朝廷派遣的海战队远征爪哇新柯沙里王朝，后元兵战败，他们走投无路，又与其他士卒一同逃往印尼、马来西亚等地。但宋元时期潮汕海外移民，总的来说还都处于零散状态，人数很少，尚无形成规模。

潮汕地区真正的海外移民浪潮发端于明代。明代初期，因有更大量的外地移民迁入，潮汕地区获得更大规模的开发，农业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陶瓷业、盐业、制糖业、纺织业及工艺品生产更加发达，而明永乐（1403—1424）、宣德（1426—1435）年间，朝廷为宣扬国威，沟通与海外的联系，又派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进一步拓展通往南洋的航路，这些都对潮州地区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和潮人前往南洋各地经商谋生有利，因此明代前中期潮州地区的私商移民和因人口过剩危机，导致无法正常生产、生活而到南洋一带另寻出路的谋生移民便开始逐步增多。到了正统（1436—1449）年间，私人海外贸易进一步兴起，潮州沿海许多下层人民均先后卷入到接济通番的走私贸易之中，逐步壮大了私人海商贸易集团的势力。当时迅速发展的私人海商贸易活动，直接造成“朝贡贸易”的日益衰落，于是朝廷为了维护其利益和巩固其地位，便在东南沿海一带严厉实行“片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的海禁政策，因海禁政策与当时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展背道而驰，使私人海上贸易不能正常进行，因此潮州商民许多便铤而走险，纷纷私造大船，配备武器，建立武装走私集团，纵横东南沿海，继续从事大规模海上走私贸易活动，以对抗朝廷罔顾民生的海禁。等到嘉靖（1522—1566）后期至万历（1573—1620）初期，私人海上武装走私集团规模日益强大，官府派兵征剿追杀，他们又再各自涌向外洋发展，在南洋一些地方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成为潮人下南洋拓殖海外的先驱，同时还开创了潮人进一步移民东南亚的风气，吸引当时潮州因“生理无路，兼以旱涝不保，饥馑沴臻，有司不能安抚存恤，致其穷苦益甚”的滨海民众“相率入海”，远赴南洋谋生，使潮汕海外移民逐步形成规模。

入清以后，潮汕地区再陆续出现更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浪潮。初是康熙元年（1662），朝廷在延续明朝的海禁政策的同时，下达东南沿海居民内迁 30 至 50 公里的“迁界令”，随着“迁界令”的实施，潮汕沿海村镇都被毁为废圩，人民游离失散，无屋可居，无

粮可吃,不堪苦楚,因此许多生活濒于绝境的人都弃家携眷,辗转流落南洋另谋生计。再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雍正元年(1723)开始有红头船现于潮州,重新开通潮州与东南亚的往来,而当时潮州地区人多地狭、人民缺食的状况更加严重,加上雍正初年潮州多次发生特大自然灾害,造成农作物全面失收,因此许多贫苦人家为了求得生存,再纷纷乘朝廷开放海禁之机,涌向暹罗、安南等地谋生。到了乾隆(1736—1795)年间,一方面因旅暹潮人后裔郑信 1767 年在率领军民抗击攻占暹罗首都大城的缅甸侵略军过程,得到当时旅暹潮籍商民的大力帮助,因此在其 1768 年复国登位建立吞武里王朝以后,对华侨实施优惠政策,积极招来大批潮州移民前往暹罗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因当时东南沿海各地相继出现严重米荒,民无以为食,朝廷为了稳定民心,维护统治,不断采取措施鼓励商人到暹罗进口大米,时与暹罗有着特殊关系的潮州红头船商人,成了中暹米谷贸易的主角,于是又带动潮州地区掀起更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使更多的潮人先后涌入暹罗。暹罗曼谷王朝初期,由于进行大规模建设活动,王室再大量接受中国移民,因此使进入暹罗的潮人进一步增多。据英国人布赛尔在《东南亚的中国人》一书中估计,1836 年曼谷城 50 万居民中,就有 40 万是华侨,其中主要是潮州人。1782 年至 1868 年,暹罗华侨达到 150 万人,其中潮州人占五分之三,约为 88 万人。潮汕移民在暹罗扎根以后,有些还再分别南下,向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迁徙,使移民的分布流向和空间逐步获得扩大。

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潮汕地区还再掀起空前规模的海外移民潮。移民分两种类型,一类是延续以往的历史传统,由旅外乡亲牵引或由专做移民出洋生意的“水客”引带的自由移民,另一类则是以“青单客”、“猪仔”等形式被拐骗、输送到东南亚殖民地的契约劳工移民。自由移民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每年达 14 至 15 万人,一般年份也有 10 万人左右(参见余顺贤《中国与南洋贸易》,1945 年),他们当时受先行移民的影响,仍以暹罗为主要移居地。契约劳工移民在 1858 年中英、中美、中法签订的《天津条约》将劳工出国合约化以后,在中国闽、粤省份迅速形成高潮,在潮汕风行了约 60 年,其输出地 1858 年《天津条约》签订以前主要是南、北美洲和澳洲,1860 年汕头开埠以后主要是输往当时沦为英、荷殖民地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1825 年至 1858 年输往南、北美洲和澳洲的契约劳工 4 万多人,而 1876 年以后从汕头输往英属荷属殖民地

的契约劳工更多,据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记载,1876年至1898年,仅马来西亚“华工每岁十余万人,由汕头来者十居六、七,由厦门来者十居二、三”。1888年至1898年输往荷属殖民地苏门答腊的潮籍劳工5万多人,1881年至1908年输往荷属殖民地日里的潮籍劳工16983人。等到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宣布禁止契约劳工出国,荷属东印度公司在汕头掠取契约劳工活动仍然没有停止,潮汕地区还继续有不少穷苦人被掠贩到印尼境内的种植园和锡矿场充当苦力。契约劳工制度被彻底废除以后,潮汕海外移民活动仍再以自由移民的方式继续进行,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其间由于军阀混战,国事日非,大革命失败,日寇侵华,潮州、汕头相继沦陷,人民继续陷于朝不保夕的悲惨境地,潮汕向海外移民的数量依然持续增多,1911年至1926年达1711173人,1927年至1928年达434010人,1930年至1939年总数达712771人。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潮汕与南洋交通断绝,潮人移民海外一度中断,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再度恢复,1946年至1948年潮汕地区又有136357人相率出洋。据《汕头市志》(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册)提供的材料,潮汕在1869年至1948年的79年中,除1929年缺乏数字,其余年份出洋人数总共达到5855557人,其中自由移民占总数移民三分之二。

### 潮汕海外移民的特点

潮汕从古代至近代历近千年的海外移民,受当时所处的历史社会背景及其地位、生存境况的影响和制约,使其在迁徙和易地谋生过程,共同呈现出一些与中国历史上由官方强制推进的人口迁移运动完全不同的特点:

其一,潮汕早期的海外移民,基本上都是受衣食驱遣而自发进行的谋生移民。移民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处于受压迫、受剥削、挨饿受冻的悲惨境地。这种状况,主要是由潮汕的地理环境和生存环境使然。潮汕地处广东东部,背山面海,地势上多山岭,少平原,境内面积最大的韩江三角洲平原,方圆不足900平方公里,仅占全区总面积的30%,其余的近70%都是山地和丘陵,而东南一面又还濒临一望无际的南海,“其为屿者十之三,其为水者又畜十之四,可耕之土无几”,且“田多斥卤”,宜耕性很差。宋代以前,潮汕由于远离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发达区,开发较晚,人口密度还很低,唐代在广东

全省 27 个州郡中居第 23 位(参见《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出版),是当时岭南人口最稀少的州郡。由于人口密度不高,耕地还比较充足,所以人民尚无明显的生存压力,多数仍可安全度日。但入宋以后,由于不断吸纳外来移民,人口密度,逐步上升,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宋元丰六年(1083),潮汕人口由唐末天复元年(901)每平方公里平均 5.5 人上升至 25.2 人,宋末咸淳六年(1271)更是达到每平方公里 50.6 人,比天复年间的人口密度上升了约近 10 倍,使其从此成为岭南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明代以降,潮汕人口增幅更大。洪武(1368—1398)至万历(1573—1620)年间,潮汕地区人口年增长率在以往基础上,平均增长了 5%。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潮汕的人口数量已由宋末淳佑六年(1246)的 14.6 万人增至 52.5 万人,万历二十年(1592)达到 54.1 万人,此后随着潮汕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口自然增长率再不断提高,人口的数量更是一一直处于迅速增长的姿势,至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潮汕人口已增加到 140.5 万人,道光(1821—1850)年间又增至 155.5 万人,到了宣统二年(1910)更是达到 540 万人,约占当时广东省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参见《永乐大典》、《万历广东通志》、《道光广东通志》、《广东年鉴》、《潮州志·人口志》的统计数字)。潮汕地区人口从宋代以后持续迅速增长,由此造成严重的人口过剩危机,而全区的耕地却十分有限,在 1.034 万平方公里的地域里,可供水稻及其他农作物种植的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欲就耕而无地力”,尽管终年劳碌的农民充分利用山之坡、路之旁、江之洲、水之滩、田之沟从事耕种,也无法克服人多地少、耕地不足的矛盾和解决“生齿繁多,其养不足”的问题。再加上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兵燹战乱和名目繁多、不堪负荷的徭役、赋税,使得许多人都无法再在原地继续生存下去,于是才纷纷被迫向外迁徙,加入到海外移民的行列。移民之初,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赤手空拳,身无长物,目的只是想凭自己一双劳动的手,在异国他乡赚点钱养家糊口。“过番”途中,为了争取早日能够浪迹异域以求安身立命而不惜忍受交股架足,偷偷地屈藏于秽气难耐的货船底舱,断粮缺水,挨饿受冻的苦痛。到了侨居地以后,他们既没有土地和房子,又没有资金和后台,面对的只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因此绝大多数又得经受披星戴月垦荒劳作之苦,或以超常的强度劳动从事开矿、筑路等工作来换取低微的回报,稍好的也只能凭藉自己的坚强毅力和顽强的适应力,依靠亲友相帮,凑点小钱,从零开始,用一个包袱

和一条扁担,长年累月辗转于穷乡僻壤从事小商小贩,或借助自己的农业耕作技术,深入山芭老林,从事垦荒种植,通过流血流汗,惨淡经营,来谋取立足和生存。后来有些虽在海外通过锐意进取,节衣缩食,使自己渐渐有所积蓄,但为了防备不测,扩大经营自己力所能及的商业、种植业,多数仍然过着艰难刻苦的生活。这种情况,延续到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扩张以后,不仅未得好转,甚至在一些地方还再成为殖民经济支配的掠夺的对象,备受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双重排斥和打击而惨遭其害。特别是那些在 19 世纪中、后期被以“契约劳工”形式拐掠、贩运到海外的苦力,更是在南洋各个殖民地历尽艰险,承受着残酷的虐待、饥饿和弃尸大海等非人待遇,当时被贩运到新加坡、槟榔屿、日里等英属、荷属殖民地充当苦力的契约移民,因遭雇主的苛酷榨取和严刑拷打而暴死于他乡、抛尸于异域者,据估计每年平均都占劳工总数的 20%。早年移民出洋谋生的苦状,正如潮汕民谣所称:“一船目汁(泪水)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火船驰过七洋洲,回头不见俺家乡,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日能回还”。由于前途茫茫,在异国他乡饿死、病死、惨遭折磨致死者层出不穷,因此南洋各地当时都有潮籍华侨辟义山,建公墓,用来收殓和埋藏在海外死无葬身之地的苦难乡亲。义山还留下对联,诉说:“渡过黑水,吃过苦水,满怀心事付流水;想做座山,无回唐山,终老尸骨归义山”。“黑水”指波涛险恶的七洲洋,“座山”指的是基业,也即钱财有所聚、事业有所成的意思。此联便道尽了早年潮汕海外移民一生的辛酸和苦痛。一些地方,还再留下“原为衣食而来,一死竟成望乡之鬼;果有轮回的话,他生莫做淘金之人”,“破浪乘风,千古英豪思前烈;开荒拓殖,一生奋斗留后人”的对联,前者言语怜恨绵绵,对苦难的先侨寄托了无限的哀思,后者则以旷远博大的情怀,鼓励后人继往开来,矢志拼搏,艰苦奋斗,造福社会。虽然潮汕历史上各时期出洋谋生的海外移民及其家族,有些凭藉顽强的毅力和过人的精神强干,先后由苦力劳工转化为中小商人、企业主,或者利用居住国商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机会,通过长期艰苦奋博,由“窶空之子”逐步变成富商大贾,但这些都集中在移民中还不占多数,即使到了目前,在海外潮人社会占多数的仍然是依靠自己的智慧、才干、毅力获取报酬的工薪族成员。所有这些都集中说明早期向海外移民并非使人迅速富裕的捷径,而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生存不得不辟地以居的无奈选择,其境况和遭遇并不象某些人所推想的那样称心和美好。

其二,潮汕早期的海外移民,都是选择海洋作为载体,以东南亚作为主要的移居地,俗称“走南洋”。这种移民趋势的形成,首先是中国与东南亚山海相连,人文相通,海上与陆地交通发达,历史上有密切的人员、商贸、政治、文化方面的往来,还有潮汕与南洋长期的商业贸易关系,以及在长期的商贸往来中积淀的比较深厚的血缘、地缘、业缘根基,这些都为移民首选南洋作为自己谋生开拓之地打下了基础。特别是近代大批移居南洋的潮人,许多更都是受早年移居南洋各地的先行移民的影响,或由他们直接招引,选择的移居地基本上都是早年前往南洋从事商业贸易的潮籍商人和移民先驱所经历过的地方。再一个原因是日趋繁荣、发达的海上交通,为潮汕移民往南洋谋生拓殖提供便利条件。潮汕在唐代末期就有通向南洋的海上交通。宋代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南洋更是经常有商船往来潮汕。到了清道光(1821—1850)年间,潮汕的海上交通,除了有经福建、江浙而直达天津的航路,还进一步开辟了经南海诸岛再西南行抵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固定航线,这些航线除了促进潮汕的海外贸易,同时也大大有助于潮汕源源不断向南洋移民。等到1860年汕头开埠通商,更大规模发展航运业,欧美一些国家和日本的轮船公司,在汕头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开通暹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缅甸、越南和香港的海上航线,经常有轮船往返于潮汕与南洋之间,同时还有以暹罗潮商为中心的近代暹(罗)、汕(头)、香(港)、叻(新加坡)贸易网络的形成,潮、客属华侨创设中暹、捷和、五福等船务公司,调派轮船经常来回航行于汕头、暹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各港口,拓展轮船运输业务,轮船除了运载南北货物,也给潮人移民南洋提供了方便。早期潮汕海外移民选择南洋作为他们的主要移居地,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南洋所有国家都地处亚洲东南部,各自拥有适合农业发展的广阔土地、可供开采的丰富矿藏、有利于发展海上交通、贸易及渔业生产的漫长海岸线和众多港口、海湾,这些都为开荒拓殖和经营农、矿、渔业及发展海上交通、从事商贸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余地,而且长期以来当地政府为了促进开发、繁荣经济,需要精明强干的商人和勤劳能干的劳动力,不断采取一些有利于吸引华侨进入的宽松政策,积极鼓励他们前往参与。如暹罗曼谷王朝建立之初,进行大规模建设活动,王室便实行自由开放政策,接受中国移民前往曼谷参加建设新都和三聘街商业区,经营航运、贸易,或到尖竹汶、挽巴功府以及他真河、夜功河和湄南河流域各地农村开垦荒地,从事胡椒、甘蔗种植,

发展经济作物。新加坡、马来西亚殖民统治时期,当地政府和西方殖民者为了加紧开发新、马的土地和资源,也不断招募华人前往参加垦荒辟路、建房种植、从事商业贸易等等。这些都对早期潮汕海外移民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和吸引力。正是有着以上这些原因,所以使早期的潮汕海外移民都集中于南洋一带,其中暹罗(泰国)居住人数最多,其次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柬埔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居住在这些国家的潮籍移民占了潮汕海外移民总数的90%。

其三,潮汕早期的海外移民,普遍有着浓厚的“根”意识,有诚挚的乡土情怀和恋乡情结。他们当初移民海外,绝大多数是想到海外谋生赚钱养活自己和接济家中的亲眷,开始都抱着临时寄居的思想,并没有长久定居他国的打算,目标是通过一番拼搏,积蓄一点钱财,然后便重返故里。这种“叶落归根”的意识和不愿远离故乡的思想,又使移民的过程终呈现出来回反复的流动特点。移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又开始有所积蓄,便在海外居留一段时间以后再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一些返回后碰上天灾人祸,无法继续在家乡立足,又再重新渡海出洋,到异国他乡寻找生路。移民的流动时时都在发生,除了不断有新的移民(俗称“新客”)到海外,而原拓殖海外的移民在侨居地居住了三、五年或五、七年以后再返回家乡者也经常可见。宋代以前,潮汕的移民因多数是乘冬季的东北季风南下参与贸易而流寓海外,他们虽然每年为等待西南季风的到来而在当地停留一些时间,但都是有去有回,因错过季风或继续留在当地从事贸易而岁不归者为数极少。明代至清代前期,因潮汕地区迅速出现地狭人稠的状况,加上私人贸易的发展和纵横海上船舶不断增多,乘贩货往来异域的机会出洋谋生的人逐步形成规模,虽然当时朝廷实行“海禁”,禁止国人私自出国和归国,致使许多出洋谋生者,受朝廷禁令的威胁,视归国为异途,留居海外不敢回国,但仍不乏有不忘故土、眷念亲人的海外游子,出国后再设法躲过官弁驻防的汛口的稽查,陆续返回家乡。近代移民的流动情况更是十分明显。据有关的统计数字,潮汕地区1869年至1890年出洋人数736713人,返回人数403624人,1891年至1900年出洋人数774081人,返回人数554912人,1901年至1910年出洋人数1067754人,返回人数788676人,1911年至1920年出洋人数938566人,返回人数400199人,1921年至1930年出洋人数1330341人,返回人数1037983人,1931年至1939年出洋人数488947人,返回人数534416人,1946年至